

蕉農支配所得與台灣經濟發展的關係

漆敬堯

一、理論基礎

研究社會科學的人都了解，在社會科學的領域內，很難將一個政治問題——或一個經濟問題、或一個社會問題——孤立起來，祇從一個角度去討論。分析經濟發展問題，至少會牽涉到經濟與非經濟（non-economic）兩大羣因素。

也許爲了方便起見，有些經濟學者，可能側重分析經濟因素，去研究某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有些社會學者，可能偏重分析非經濟因素，去觀察某個社會是否走上進步的大道。

憑常理推斷，經濟學者分析經濟因素去看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學者分析非經濟因素去看任何社會的進步現象，最後很可能殊途同歸，都在研究某一個特定地區是否朝現代化的方向前行。

以往的事實說明，不少已經發展國家的人，幾乎普遍具有較新的觀念，繼續推動那些國家進步。一些低度開發社會的人，可說多數保留傳統思想，去抵抗社會變遷、去延緩經濟發展。

由這些事實可以看出，某些經濟學者從經濟觀點看任何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學者從非經濟觀點看任何社會進步現象，是可以合流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彼此相輔相成。經濟有了發展，會推動社會進步、產生新觀念。社會有了進步、產生新觀念，也會促使經濟發展。

基於這種理論，來研究「蕉農支配所得與台灣經濟發展關係」的問題，似乎可以顧得全局。蕉農支

配所得供生活費用、供其他消費之用；蕉農支配所得去投資、去增產；蕉農支配所得去訂閱報紙、購買收音機或（和）電視機去自我教育、並且進一步教育他們的孩子。他們這些經濟和非經濟行為，好像都和台灣的經濟發展有聯。

二、研究方法

國立政治大學民意測驗中心，曾接受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香蕉輔導小組委託，在民國五十五年七月一個月之內，派遣訪員陸續訪問高雄、屏東、雲林、台中、南投五縣主要產蕉地區的成年蕉農四百人，查詢他們支配所得的方向是否與台灣省的經濟發展有聯。

作者以研究人員身分，全盤處理上述計劃，從設計抽樣、擬擬題目表、訓練訪員進行訪問工作、分析訪員所搜集的資料，盡可能的小心謹慎，來觀察蕉農支配所得的行為。

推行上述計劃，是採用區域抽樣（area sample），從高、屏等五縣產蕉區域中，抽出成年蕉農四百人，作為訪問的對象。再從接受訪問蕉農所發表的意見，來推斷全體成年蕉農的意見。

撰擬的題目格式，與一般民意測驗單位所用的「是非題」、「選擇題」、「問答題」相同。題目的措辭，前後更動了五次，並且依照規定，作了一次預訪（pre-test）。將答問人不太了解的語句，作最後一次修改。

國立政治大學家住蕉區附近鄉鎮的學生二十人，擔任訪員工作。他們在出發訪問之前，曾接受短期訓練，對訪問蕉農應有的技巧、提問題的方法，都有適當的了解。

訪員訪問指定對象後所得到的資料，用電子計算機統計並計算卡方。然後由作者草寫研究報告。

三、研究後的發現

根據訪員所搜集的資料內容看，有不少發現。現在，僅將所發現的重點，分條一一在下面陳述。

第一、從蕉農支配所得的全貌看：

(1)過半數蕉農(百分之五十五強)將蕉款作消費用；少數(百分之三十四強)拿蕉款去投資和儲蓄；極少數(百分之十強)用蕉款去還債。

(2)新蕉農，教育程度低、經濟狀況差、不看報以及雲林地區、中部地區的蕉農，拿蕉款去消費的較多；老蕉農，教育程度高、經濟狀況好、看報、旗山地區以及高屏一般地區的蕉農，拿蕉款去消費的較少。

(3)老蕉農，教育程度高、經濟狀況好、看報以及旗山地區的蕉農，拿蕉款去投資和儲蓄的較多；新蕉農，教育程度低、經濟狀況差、不看報以及雲林地區的蕉農，拿蕉款去投資和儲蓄的較少。

(4)老蕉農，國校畢業、不識字、經濟狀況普通和清寒、不看報以及旗山地區的蕉農，用蕉款去還債的較多；新蕉農，小學肄業、中學程度、經濟狀況寬裕和中上、看報以及高屏一般地區、雲林地區、中部地區的蕉農，用蕉款去還債的較少。

第二、從蕉農支配所得所牽涉的經濟行為看，可分為投資和儲蓄、消費等等方面。

甲、在投資方面

蕉農支配所得與台灣經濟發展的關係

(1) 過去三年（從民國五十二年八月到五十五年七月，下同），少數蕉農（百分之十九）添蓋過堆肥舍（堆肥料的地方）。老蕉農，經濟狀況好的蕉農，添蓋過的較多；新蕉農，經濟狀況差的蕉農，添蓋過的較少。蕉農添蓋過堆肥舍與否，和他們的教育程度無關。

蕉農添蓋堆肥舍去堆肥料，多使用肥料，對於台灣省肥料工業的發展，自然有貢獻。

(2) 過去三年，多數蕉農（百分之六十七點五）買過農具。老蕉農，教育程度高、經濟狀況好以及看報的蕉農，買農具的較多；新蕉農，教育程度低、經濟狀況差以及不看報的蕉農，買的較少。蕉農中有百分之三十買了噴霧器；有百分之十八買了抽水機。

蕉農大量購買噴霧器、抽水機的結果，當然可以協助這種機器工業的發展。噴霧器是用來噴射農藥的。蕉農每年要用一大筆錢去買農藥，對於製造農藥工業的發展，相信也有幫助。

(3) 絕對多數蕉農（百分之九十八）使用支柱撐香蕉樹，因此，每年要花新台幣三億多或四億多元購買竹子。那些出售竹子的竹農，也很可能將所得的一部份，用在與發展台灣省工業有關的方面上去。

蕉農最初知道使用支柱，由別人那裏獲得消息的最多（百分之九十二）。老蕉農靠上一代和自己經驗得知使用支柱的較多；新蕉農從別人那裏和從青果合作社（或農會）職員那裏得知的較多（支柱推廣工作，中部地區從民國五十一年開始，高屏地區從五十二年開始）。

(4) 過去三年，少數蕉農（百分之二十二弱）蓋過養豬舍（豬欄）。蕉農蓋過豬欄與否，和他們是老蕉農還是新蕉農，他們的教育程度、經濟狀況都無關。

養豬是蕉農的副業，種蕉人家大都在養豬。事實上，養豬所用的飼料（如加工後的豆餅），一部份

是工業品。因此，蕉農養豬，多少與豆餅工業的發展有關。

(5) 過去三年，少數蕉農（百分之三十三弱）發動過本村或本鄉、本鎮的人鋪路。小學肄業、中學程度、國校畢業的蕉農，經濟狀況中上、清寒、寬裕的蕉農，看報的蕉農以及雲林地區的蕉農，發動鋪路的較多；不識字、經濟狀況普通、不看報的蕉農，高屏一般地區、中部地區、旗山地區的蕉農，發動鋪路的較少。

發動鋪路是一種社會性質的投資，很富有經濟價值，可使用路的人分享道路所產生的好處。

乙、在儲蓄方面

(1) 以高雄縣旗山鎮農民（當地農民中的百分之九十五是蕉農）志願向農會和信用合作社存款以及借錢的情形為例來說，他們的存款數字很大（民國五十五年六月底存款數最多，達新台幣一億八千二百餘萬元，全鎮人口不到五萬人），其中一部份轉存到各行、庫再貸放給工商等行業，間接協助台灣省的經濟發展。此外，他們借錢去投資的數額也不少。

(2) 大多數蕉農感覺稅款負擔不輕（百分之三十八說稅重；百分之四十一說稅很重）。假定政府採用加稅方式強制蕉農儲蓄來發展經濟，他們可能不太願意。

此外，老蕉農，經濟狀況寬裕和清寒的蕉農，說稅款負擔很重的較少；新蕉農，經濟狀況中上和普通的蕉農，說稅款負擔很重的較多。蕉農說稅款負擔輕、重，與他們的教育程度、與他們看報不看報都無關。

丙、在消費方面：

(1)過去三年，少數蕉農（百分之三十五）修過房子或者添蓋過新房子。蕉農修、蓋房子，與他們是老蕉農還是新蕉農無關。經濟狀況好的蕉農，修、蓋房子的較多；經濟狀況差的蕉農，修、蓋房子的較少。

蕉農修蓋房子，多少會買一些鋼筋、水泥、油漆等等工業產品，幫助這幾類工業發展。

(2)過去三年，大多數蕉農（百分之七十一強）買過耐用物品（如電器）。老蕉農，教育程度高、（經濟狀況好）、看報的蕉農，買耐用物品的較多；新蕉農，教育程度低、（經濟狀況差）、不看報的蕉農買的較少。

過去三年，蕉農中有百分之十一，買了電晶體收音機；百分之二十七，買了室內用的收音機；百分之十四，買了電唱機；百分之八買了電視機；百分之四買了電冰箱；百分之三十二，買了縫衣機；百分之五十二，買了腳踏車；百分之十九，買了機器腳踏車；百分之二買了馬達三輪車。

蕉農買耐用物品，一方面固然可以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一方面也會協助製造耐用物品工業的發展。

(3)過去一年（從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到五十五年七月，下同），少數蕉農（百分之三十三強）曾出外旅行。教育程度高、經濟狀況好、看報的蕉農，出外旅行的較多；教育程度低、經濟狀況差、不看報的蕉農，出外旅行的較少。

蕉農出外旅行，對台灣省觀光事業——一種新式工業——的發展，多少有點幫助。

(4)少數蕉農（百分之三十五強）認為可以簡化拜拜，用鮮花來替代酒菜。但蕉農所發表的簡化拜

拜意見，與他們的教育程度無關（作者曾用蕉農的年齡特性和簡化拜拜意見交叉分析，結果二者無聯。這可能由於年青人務農的較少。在四百名接受訪問的蕉農中，僅有二十五人的年齡，在二十到二十九歲之間）。

（5）過去一年，多數蕉農（百分之六十六弱）捐錢蓋過廟。教育程度高、經濟狀況好以及看報的蕉農，捐錢蓋廟的較多；教育程度低、經濟狀況差以及不看報的蕉農，捐錢蓋廟的較少（作者也曾用蕉農的年齡特性和捐錢蓋廟的情形交叉分析，結果二者無關。理由和簡化拜拜的情況相同）。假定單從蓋廟使用建築材料的觀點看，蓋廟也或多或少與工業發展有關聯。

（6）極少數蕉農（百分之十五上酒家、去茶室；百分之三看情形決定是否上酒家、去茶室）認為上酒家、去茶室坐坐，沒有甚麼關係。蕉農上酒家、去茶室，與他們是老蕉農還是新蕉農無關。教育程度高、經濟狀況好的蕉農，上酒家、去茶室的較多；教育程度低、經濟狀況差的蕉農，上酒家、去茶室的較少。

第三、從蕉農支配所得所牽涉的非經濟行為看，可分為接觸大眾媒介、教育孩子、等等方面。

甲、在接觸大眾媒介方面：

（1）過半數的蕉農（百分之五十四）看報。老蕉農，教育程度高、經濟狀況好的蕉農，看報的較多；新蕉農，教育程度低、經濟狀況差的蕉農，看報的較少。

看報的蕉農中，多數（百分之六十三強）訂報在家裏看；大多數（百分之七十三強）而且天天看。

看報的蕉農中，多數（百分之六十七強）同時看知識和娛樂性質的資料。蕉農看報紙的內容，與他們的教育程度、經濟狀況都無關。

蕉農中不識字的約有兩成、小學肄業程度的也約有兩成、國校畢業程度的約有四成、中學程度的約有兩成（見原始資料）。也許由於教育程度的原因，看報的蕉農祇有過半數。但看報的蕉農，多少會從報紙上獲得新的知識，吸收新的觀念，來推動社會進步。

（2）大多數蕉農（百分之七十六）聽廣播。中學程度、小學肄業、國校畢業的蕉農，經濟狀況中上、寬裕、普通的蕉農，聽廣播的較多；不識字、經濟狀況清寒的蕉農，聽廣播的較少。

聽廣播的蕉農中，絕對多數（百分之九十四強）買了收音機在家裏聽；多數（百分之六十五強）而且天天聽。

聽廣播的蕉農中，多數（百分之六十四強）同時聽知識和娛樂性質的節目。小學肄業、國校畢業、不識字的蕉農，經濟狀況普通、中上、清寒的蕉農，同時聽知識和娛樂性質節目的較多；中學程度、經濟狀況寬裕的蕉農，同時聽知識和娛樂性質節目的較少。

也可能由於教育程度的關係，聽廣播的蕉農，較看報的蕉農要多百分之二十二。

比較令人感到興趣的，莫過於小學肄業、不識字的蕉農，經濟狀況普通、清寒的蕉農，同時聽知識和娛樂性質節目的較多。這似乎說明，教育程度低、經濟狀況差的蕉農，也有心吸收新知識。不過，他們祇能從那些「寓知識於娛樂之中的節目」裏面，獲得一些新觀念。分量較重的純知識性質節目，恐怕他們消化不了。

(3)多數蕉農(百分之七十弱)曾經看過電視。僅有百分之八的蕉農買了電視機在家裏看。自備電視機的蕉農中，不少人(百分之四十五強)隨便看，不選擇節目；還有不少人(百分之三十八)祇看娛樂節目。

也許因為電視機的價格不低、也許由於台灣省中南部的電視轉播網在民國五十四年十月才完成，蕉農自備電視機的人數很少。或者因為蕉農看電視完全是爲了娛樂、或者由於電視節目很少廣播與香蕉有關的知識，或者由於電視所播出的語言不同，蕉農就隨便看看、或者看點娛樂節目。

(4)蕉農接觸報紙、廣播、電視等等大眾媒介，固然可以增加知識、推動社會進步；同時，也會協助報紙、廣播、電視等等企業擴充設備，促使有關的工業發展。

報館、廣播電台、電視台，有了機器才能生產報紙、才能製作廣播或電視節目。看報的人要識字、聽廣播和看電視的人、可能要買收音機或(和)電視機。這種種都與經濟發展有關聯。事實上，工業生產能力越高的國家，大眾媒介才越會發展(註一)。

乙、在教育孩子方面：

(1)不少蕉農(百分之四十七強)有孩子上中學。教育程度高、經濟狀況好、看報的蕉農，有孩子上中學的較多；教育程度低、經濟狀況差、不看報的蕉農，有孩子上中學的較少。

也許由於多數蕉農的孩子還小，不到上中學的年齡，所以，有孩子上中學的蕉農不到半數。教育程度高、經濟狀況好、看報的蕉農，有孩子上中學的較多，似乎很符合常理。蕉農和其他的人一樣，都在教育下一代，使孩子們獲得較多的知識，能爲人上人。

(2)大多數蕉農(百分之七十四強)想過送孩子進大學。教育程度高、經濟狀況好、看報的蕉農，想過送孩子進大學的較多；教育程度低、經濟狀況差、不看報的蕉農，想過送孩子進大學的較少。

大多數蕉農有送孩子進大學的動機。假定沒有特殊障礙，他們很可能朝着動機的方向去行爲——送孩子進大學。無疑的，蕉農已經了解教育的重要性，會盡力去栽培下一代。從蕉農的觀點看，他們的孩子有了知識，至少孩子自己將過較好的生活。他們並且很可能認定孩子們會維持中國人的傳統，將來再仰事父母。

(3)多數蕉農(百分之六十五)認為孩子的發達機會，比他們的發達機會好。國校畢業、小學肄業、中學程度的蕉農，經濟狀況中上、寬裕、普通的蕉農，看報的蕉農，認為孩子發達機會好的較多；不識字、經濟狀況清寒、不看報的蕉農，認為孩子發達機會好的較少。

蕉農一如其他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有發展、有成就。蕉農之所以支配他們的所得，在教育孩子方面投資，總認為孩子有發達機會。至於知識較少、財力不足的蕉農，不敢對孩子將來的發展機會持太樂觀的看法，可能由於他們無法使孩子受較好的教育。

綜合以上各點說明可以看出，蕉農支配他們的一部份所得去投資、去消費、去接觸大眾媒介自我教育、去教育他們的孩子，在在都與台灣省的經濟發展有關聯。

四、進一步分析

根據經濟學者的觀點看，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大概有四個階段：

(一)所得中的一部份作為消費之用，其餘都是儲蓄。

(二)運用儲蓄或借助外資（或外援）增加生產能力之後，會增加所得，儲蓄也隨着增加。所得提高，消費比例減少，儲蓄比例增加。因為儲蓄和投資是一體的兩面，所得中的一部份即使消費掉，還有一部份可用去投資。

(三)所得增加後，消費會誘導較多的投資，投資需要較多的儲蓄（股票或銀行借款）。在高所得的國家，儲蓄越多，投資也越多。

(四)所得更為增加，消費並不成固定比例增加。於是，儲蓄更為增加，資本更多就得謀出路。這就是資本形成的來源。

任何一個國家怎樣來增加生產能力，以便增加所得，那個國家的政府自然有責任。現代經濟學者，幾乎都揚棄了十九世紀風行的放任主義，主張政府來協助人民發展經濟。

美國經濟學者山繆遜（Samuelson）就說過，今日在我們相互依賴的社會裏，個人主義不能容忍（註一）。

美國學者彌爾和包爾溫（Meier and Baldwin）也表示過，在貧窮的國家裏，需為比較强有力的政府行動來加速發展。因為這些國家靜止不動的時間太長，積極的政府干預，才可使這些國家活躍起來（註二）。

美國學者麥克里蘭（McClelland）提出兩大投資優先型態的主張，促使落後地區的經濟發展：一、技術援助農業以及鄉村的社區發展，尤其是援助農業，可增加大多數人們的所得；二、訓練工業所需

的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註四）。

中國政府近十多年來發展台灣省的經濟所採取的政策方向，和麥克里蘭的主張可說完全符合。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一般人簡稱爲外貿會）輔導蕉農增產、爭取香蕉外銷，不過是一個顯明的例證。

（按：外貿會從民國五十二年四月起，推行新政策，督促生產及運銷香蕉的雙方協議，提高收購香蕉產地價格。原先每簍香蕉，平均僅新台幣一〇四元。從當年四月起，每簍蕉價提高到一六三元。到當年十月，每簍蕉價再提高到二〇三元。五十二年外銷香蕉量，比五十一年輸出量僅增加百分之五。但每戶蕉農在五十二年平均所得，較五十一年平均所得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這樣一來，蕉農種蕉的興趣就大爲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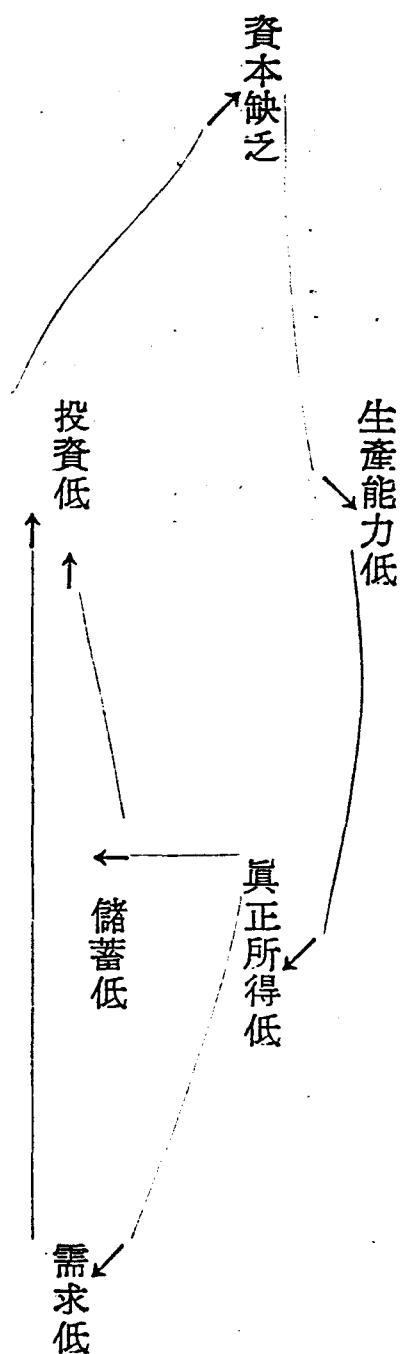
政府設法提高蕉農的所得，蕉農的生活固然因而改善，蕉農支配所得，也和台灣省的經濟發展有關聯。這足以說明政府協助人民增加收入之後，無形中會加快台灣省的經濟發展。現在，再從蕉農「所得」、「消費」、「接觸大眾媒介」、「孩子學校教育」等四個小項目，作進一步分析。

甲、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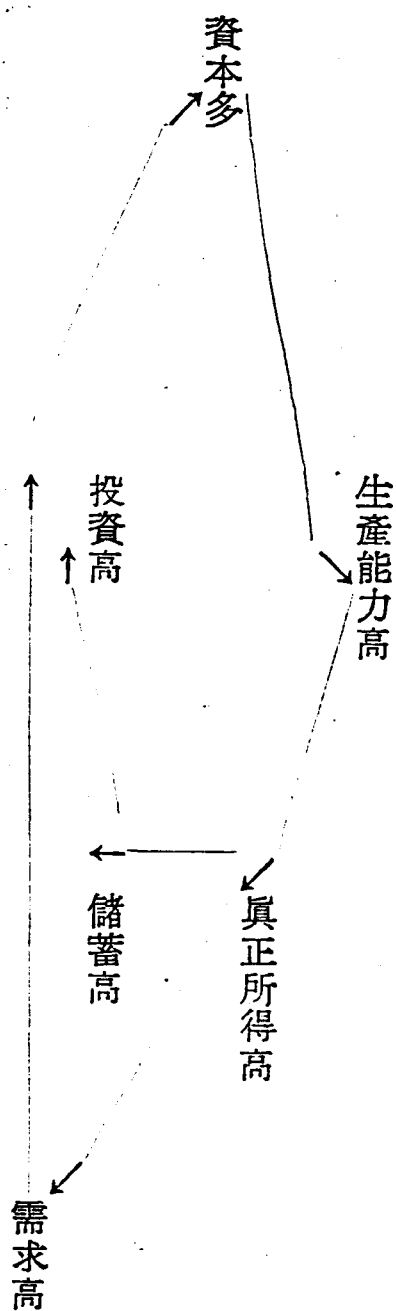
在前面曾簡略提到經濟學者將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過程分成四個階段的理論。現在，就來看看這種理論與台灣省經濟發展的事實是否相吻合。

有些西洋經濟學者談到落後地區「惡性循環」（vicious circles）的經濟問題（註五）。依照他們的理論，落後國家的資本缺乏、生產能力低、一般人的真正所得低、儲蓄低、需求低、投資低、資本缺

乏（見下圖）。這樣循環下去，落後國家很難謀求經濟發展。



反過來看，正在發展以及已經發展的國家，也會形成一個經濟上的「良性循環」（benificent cycle）（註六）。那就是資本多、生產能力高、一般人的真正所得高、儲蓄高、需求高、投資高、資本多（見下圖）這樣循環下去，正在發展的國家可以進一步圖經濟發展。已經發展的國家必須替更多的資本找出路。



近十幾年來，台灣省得到外援以及華僑、外人的投資，突破了落後國家資本缺乏的障礙，慢慢走上經濟發展的大道。

就政府輔導蕉農增產、爭取香蕉外銷以提高蕉農所得來說，自然會使蕉農加多需求、添多儲蓄，進一步提高投資、增加資本、增加生產能力，再提高一般人所得。

以訪員所搜集的資料來看，旗山鎮蕉農所得提高之後，向當地農會和信用合作社存款的數額也隨着增加。其中一部份轉存到行、庫再由行、庫投資到工商等行業，間接協助台灣省的經濟發展。在另一方面，旗山鎮蕉農所得提高之後，他們的需求也隨着提高。因此，他們大量購買電視機、電冰箱等等享用品以及機器腳踏車等等工具用品。蕉農的這種消費行為，直接有助於這些電器、機器工業的發展，促使這些工業增加投資數額，進一步推動經濟上的「良性循環」。

在民國五十二年八月到五十五年七月這三年中間，旗山地區蕉農購置電唱機、電視機、電冰箱以及機器腳踏車的數量，遠在高屏一般地區、雲林地區、中部地區蕉農所買數量之上。但旗山地區蕉農存款的數額仍舊很高。

爲甚麼旗山鎮蕉農消費多、儲蓄也多？理由很簡單，就是他們的所得增加了。

研究經濟學的人都了解，一個成年人每月所得假定祇有六百元新台幣，除掉吃伙食零用之外，恐怕不能存錢了。假定這個人一月所得從新台幣六百元跳到八千元，即使他在一年之內買一架電視機、一輛機器腳踏車，他可能還要賸點錢（註七）。

都有助於台灣省的經濟發展。

乙、消費

不少經濟學者認為消費可以刺激生產。但消費刺激生產的原則是否適用於落後地區，是否適用於正在發展中的社會，却是一個爭辯問題。

有些經濟學者，用概括方式表示意見，贊成「消費」這一原則。

美國農業經濟學者畢夏普和陶聖特（Bishop and Toussaint）就說過：「當消費者增加所得後，他們就會多購買額外的貨品和勞務」（註八）。

英國學者包爾和耶梅（Bauer and Yaney）也說過：「落後國家需要的變動，會刺激經濟發展」（註九）。

美國學者金德柏格（Kindleberger）表示過：「經濟發展以消費者為轉移的程度，等於或多於以企業家為轉移的程度」。他並且指出：「在許多落後國家，高水準的消費可能是高度生產的必要條件」（註十）。

美國學者皮皮勒西、米爾斯、亞德爾曼（Pepelasis, Mears and Adleman）認為一個「社會」的消費習慣，會反映「它」的價值觀念。和工業社會的照相機、收音機、手錶等產品接觸之後，將會改變人們的傳統看法。這樣，就可不費力的向他們介紹那些可能適合經濟、社會變遷的新方法（註十一）。有些經濟學者很具體的說明，落後地區的人們買進口貨，拿錢去蓋神廟，有礙經濟發展。

英國學者納克塞（Nurkse）覺得落後地區的人們買進口貨消費之後，更會刺激他們去消費，這就

有礙經濟發展。消費不僅影響個人的志願儲蓄 (voluntary saving)，而且影響強制儲蓄 (compulsory saving or forced saving)，使政府不易使用稅款去發展經濟 (註十一)。

美國學者路易斯 (Lewis) 強調落後國家的人們拿錢去蓋神廟、去買 (用外匯進口) 耐用物品，而不創造生產資本，賸餘無幾，生產投資就少了 (註十三)。

從西洋學者贊成和反對消費的觀點看，恐怕很難對消費問題獲得定論。

就蕉農所買的耐用物品而言，這種貨物可說都是國人投資以及國人與外人合作投資在台灣省開廠生產的，並不會浪費很多外匯從國外進口。即使外人來台與國人合作開廠賺了一些錢帶回去，至少為國人製造了不少工作機會。何況，這些工廠一部份製成品由本地消費者購買，也可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

最受人攻擊的，莫過於台灣省農民 (包括蕉農在內) 花錢去做拜拜、去蓋廟、去上酒家的事實。

先就拜拜、蓋廟來說，那是農民信仰宗教的一種表現，也是農民風俗習慣的寫照。做拜拜、蓋廟可說由來已久。

從經濟學者的眼光看，做拜拜、蓋廟是農民不治生產的行為，毫無經濟價值。

但人不完全是經濟動物，人也需要過精神生活。祇有那些無神論的共產黨徒，才不許人民敬祖先、蓋寺廟。

從社會學者的觀點看，農民做拜拜、蓋廟這種含有宗教意味的行為，會產生安定他們心理的力量。

美國學者麥德 (Mead) 曾說過，對農業專家而言，農民用大量金錢和精力去參與一些儀式的，魔

術的以及宗教的活動，以平民為最，且對農民最有益。

Barrow, L. H. (1931) p. 111.

心理不安。在很多傳統文化裏，宗教和農業不可分離（註十四）。

美國學者施勒姆（Schramm）也表示過，個人在人羣中可以享有一大部份（心理）報酬。在人羣中，個人學習表演一定的角色、跟隨一定的規範。角色和規範的了解，可幫助個人在人羣中過舒適、愉快的生活（註十五）。蕉農做拜拜、蓋廟，也無非想在人羣中過舒適、愉快的生活。

蕉農做拜拜、捐錢蓋廟，目的在求心之所安，與心理建設沒有太大的不同。難道有人反對蕉農用做拜拜、捐錢蓋廟的方式去增加他們生產的信念？難道有人反對蕉農在人羣中過舒適、愉快的生活？

有些人覺得蕉農可以做拜拜、可以捐錢蓋廟，但不可過份浪費。這些人也許基於節約的觀點，才提出那種主張。

以做拜拜所用的酒菜而言，酒是公賣品，站在政府的立場，惟恐人民不消費公家的產品。至於蕉農自己所養的豬，如果沒法外銷，似乎不能「儲蓄」起來，留到他日再用。

生豬和豬肉製成的肉鬆、製過肉及火腿、凍肉，輸出不太理想。從民國四十九年起至五十五年六月底止，生豬和豬肉製成品所換的外匯有增有減，但近一、二年來，却有減少的趨勢（見下表）。

表一 生豬及豬肉製成品輸出金額

(民國四十九年至五十五年六月底)

金額單位：千美元

年 別	項 目	生 豬	肉 鬆	製 過 肉 及 火 腿	凍 肉
四十九年		2,632	——	——	102
五 十 年		2,388	——	26	——
五十一年		2,185	4	90	——
五十二年		564	10	8	73
五十三年		224	10	523	13
五十四年		150	11	287	8
五十五年 (六月底)		149	8	——	——
資料來源：		①外貿會編印中華民國台灣輸出入結匯統計(民國四十九年至五十三年)			②外貿會調查研究室供應(民國五十四年至五十五年六月底)

又根據農復會五十六年三月廿三日所發表的新聞（見三月廿四日台北各大報），五十五年毛豬屠宰數達三百萬頭，比四十五年的屠宰數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所宰三百萬頭毛豬共重二十七萬多公噸，比四十五年所宰毛豬重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二。但五十五年台灣省的人口，較四十五年的人口僅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足見一般人吃豬肉的數量比十年前大為增加。其中自然包括蕉農做拜拜所吃的豬肉在內。

有些人以為節約就等於儲蓄。事實上，節約並不一定等於儲蓄。蕉農所養的生豬就無法「儲蓄」。

有些人以為任何社會的人祇要有儲蓄就可幫助經濟發展，事實也不盡然。假定蕉農將所賺的錢購買黃金、珠寶窖藏起來，變成「死的儲蓄」，恐怕反有礙台灣省的經濟發展。與其讓蕉農可能將錢變成「死的儲蓄」，倒不如由他們將錢買酒做拜拜，增加公家的收益，再由政府使用去發展經濟為好。

有些擔任行政工作的人，每逢民間大拜拜時，就發表意見，透過報紙等等大眾媒介，奉勸做拜拜的人，不必過份浪費。這種意見，恐怕很難由做拜拜的人所接受。

美國大眾傳播權威施勒姆曾經表示過，大眾媒介絕不能改變人們根深柢固的態度、價值觀念或社會習慣。人們祇選擇那些支持他們強烈信念的新聞或廣播，也拒絕看、聽那些不支持他們強烈信念的新聞或廣播（註十六）。

行政工作人員透過大眾媒介去勸導人民不要因做拜拜而消費過多，可說收不到半點效果。

蕉農捐錢蓋廟的行爲，也和他們做拜拜一樣，在短期內不易受人勸導而改變。

一般說起來，任何社會的風俗習慣，要過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起變化，也許在二、三十年後年青的一

代長大了，會很自然的修改做拜拜的作風，修改捐錢蓋廟的習俗。這和中國人過農曆年的情形相髣髴，需要時間來沖淡。何況，接受訪問的蕉農中，少數（百分之三十五強）認為可以簡化拜拜。

至於蕉農上酒家、去茶室，不僅是純消費行為，而且牽涉到善良風俗問題。假定行政當局真有決心取締酒家、茶室，用一紙行政命令就可辦得到。

但任何問題有正反兩面。假定台灣省人沒有上酒家、茶室的習慣，即使開設了酒家、茶室，也不會有顧客光臨，最後可能被迫停業。如果台灣省人有上酒家、去茶室的習慣，即使行政當局取締了公開的酒家、茶室，地下的酒家、茶室又可能應運而生，公家反會喪失一部份稅款。

祇有「時間」這個因素，才能慢慢改變人的習慣。日子久了，上酒家、去茶室的風氣，也許會起變化。

丙、接觸大眾媒介

研究「傳播」(Communication)的西洋學者，大都討論過「人與人之間的傳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和「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的問題。

所謂「人與人之間的傳播」，是指人與人面對面交談、做姿勢來相互交換消息、溝通意見而言。譬如兩個人談話；少數人開會、上課；多數人聽講演等等。

所謂「大眾傳播」，是指報紙編輯部，電台或電視台的節目部工作人員，向讀者、聽衆、觀衆報導消息，同時搜集讀者、聽衆、觀衆的意見，來改進報紙內容，廣播節目或電視節目的內容而言。

「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固然有來有往（如兩人談話你講幾句；我講幾句）；「大眾傳播」，也是有

來有往（如廣播電台向聽眾廣播節目；聽眾也可表示意見，請電台改進節目內容）。不過，「大眾傳播」來往的情形，不像「人與人之間的傳播」來往情形那樣明顯。

研究「傳播」理論的西洋學者，根據實驗的結果，發現「人與人之間的傳播」的效力，大於「大眾傳播」的效果（註十七）。不過，「大眾傳播」——透過報紙、廣播、電視這些媒介，可和成千成萬的讀者、聽眾、發生來往關係——比「人與人之間的傳播」來往的人數多得多。因此，「大眾傳播」也有「它」的優點。

根據訪員所獲得的資料看，蕉農知道使用支柱（支柱推廣工作，中部地區從民國五十一年開始；高屏地區從五十二年開始）的消息來源共有六種。其中四種是「聽別人說的」、「看人家用了之後學來的」、「從上一代學來的」、「從青果合作社（或農會）職員那裏聽來的」，佔知道使用支柱蕉農全體中的百分之九十一強；另兩種是「自己經驗出來的」、「看資料知道的」，佔知道使用支柱蕉農全體中的百分之八（看資料知道使用支柱的僅一人）由此可見向蕉農進行某種推廣工作，最好採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方式，比較容易產生效果。

民國五十二年八月有關機構組成的香蕉增產督導團，從九月二日到十月二日這一個月之間，分別和三萬一千多蕉農在蕉農大會上見面，講解香蕉增產有關的問題（註十八）。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傳播」方式，所收效果較高，當無疑問。

假定要透過報紙、廣播、電視這些大眾媒介，向千千萬萬的蕉農傳佈消息或知識，最好和蕉農看報紙、聽廣播、看電視的行為相配合，才會收到較大的效果（如果透過報紙向一部份不看報的蕉農傳佈消

息或知識，就毫無效果之可言。這種情形，同樣適用於廣播和電視。

根據訪員搜集的資料看，過半數的蕉農（百分之五十四）看報；大多數蕉農（百分之七十六）聽廣播；多數蕉農（百分之七十弱）看過電視。這足以說明聽廣播的蕉農人數，多於看報紙、看過電視的蕉農人數。

其次，看報的蕉農中，多數（百分之六十三強）訂報在家裏看；大多數（百分之七十三強）而且天天看。聽廣播的蕉農中，絕對多數（百分之九十四強）買了收音機在家裏聽；多數（百分之六十五強）而且天天聽。全體蕉農中僅百分之八有電視機。這足以說明多數蕉農有收音機可用，天天聽廣播的人數也不少。

再其次，看報的蕉農中，多數（百分之六十七強）同時看知識和娛樂性質的資料。蕉農看報紙的內容，與他們的教育程度、經濟狀況都無關。

聽廣播的蕉農中，多數（百分之六十四強）同時聽知識和娛樂性質的節目。小學肄業、國校畢業、不識字的蕉農，經濟狀況普通、中上、清寒的蕉農，同時聽知識和娛樂性質節目的較多。

看過電視的蕉農，大多數隨便看，並不選擇電視節目。

這足以說明「知識和娛樂」性質的報紙內容或廣播節目，較易由蕉農接受。尤其是小學肄業、不識字的蕉農，經濟狀況普通、清寒的蕉農，也多聽「寓知識於娛樂之中」的廣播節目。他們可能因聽廣播而吸收一些新知識。

輔導蕉農的政府有關機構，對所有蕉農都是平等看待的。假定當局想對教育程度低、經濟狀況差的

蕉農灌輸一些生產香蕉的知識，目前恐怕祇有借用「廣播」這個大眾媒介了。

訪員訪問蕉農時，有些蕉農提出意見，希望有關方面重視蕉農教育、宣傳種蕉注意事項。他們的建議，值得主管當局參考。

（根據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民國五十五年六月出版「台灣農業經濟概況」的記載，農業普查結果，發現在四十四年時，台省農家三六、三一六戶訂閱報紙，到四十九年時，訂報的農家增到四八、五二〇戶，比四十四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三強。在四十四年時，農家買收音機的，有一九、一九五戶，到四十九年時，農家買收音機的增到一八五、五二〇戶，比四十四年增加八倍以上。由此可見收音機在台灣省農村普遍的情形。）

丁、孩子學校教育

近十幾年來，台灣省人口激增。小孩子出生後至少要受國民教育。甚至爲人父母者，有心培植自己的孩子進中學、上大學。學生人數一天天在增加，可惜大都擠往普通中學，對職業中學的興趣不高。

依照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的統計（見下表），民國五十四年台灣省普通中學計五四六所，比四十八年普通中學三四四所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五十四年台灣省職業中學一二八所，較四十八年職業中學一九所增加了百分之十八。

表二 臺灣省普通與職業中學所數及學生人數 (民國四十八年至五十四年)

年 別	普通中學學校所數	職業中學學校所數	普通中學學生人數	職業中學學生人數
四十八年	344	109	317,044	77,880
四十九年	361	109	354,561	84,337
五十年	399	111	408,739	88,335
五十一年	437	110	462,466	91,693
五十二年	481	114	524,331	96,888
五十三年	521	121	593,109	106,811
五十四年	546	128	661,961	117,246

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主計室所編之台灣教育統計

就學生人數來說，五十四年台灣省普通中學計六十六萬一千九百六十一人，比四十八年普通中學三十一萬七千零四十四人，增加了一倍以上。五十四年台灣省職業學校計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六人，較四十八年七萬七千八百八十人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不論從學校數目看，也不論從學生人數看，近年來普通中學的發展，遠比職業中學的擴充要快得多。

也許蕉農受社會浪潮影響，也許蕉農受國人重視讀書人傳統觀念的影響、也許蕉農認為有孩子進大學可以提高他們在農村社會的地位（最好孩子學而優則仕），大多數人（百分之七十四強）想過送孩子上大學。假定沒有特殊障礙，成千成萬的蕉農子弟，將來勢必擠各大學的大門。

無疑的，一個社會裏的大學生人數多，並不是件壞事。受教育越多的人，越有知識推動那個社會進步。

但台灣社會目前迫切需要的，不是數目衆多的工程師和坐辦公室的管理人員，政府官員，而是有一技之長的技術員。

根據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人力資源小組的估計，推行第四期四年經濟計劃，在民國五十四年到五十九年這五年中間，台灣省每年平均需要各種技術員七萬七千餘人。但各職業學校每年結業學生僅一萬二千餘人（註十九）。另外六萬五千多工作沒有人做，尤其以機、電、泥、木等方面的技術員缺額最多。

近兩年來，政府正在努力提倡職業教育，但願意接受職業訓練的青年還是不够踴躍。其所以如此，可能歸因於社會風氣鼓勵人進大專學校、可能歸因於一般人不重視技術員的地位、可能歸因於接受職業

訓練的人所學不能完全致用，被排斥於農場、商業機構之外……。

現在，要想改變一般人輕視學習技藝的觀念，不是件易事。但似可從獎勵、工作名位、提高工資三個方向求發展。

就獎勵說，政府不妨提出一筆獎學金，作為職業教育投資之用，讓家庭清寒的青年學習謀生的本領。假定有眼光的企業家自己來興學，使學生用半工半讀的方式上學，經常有點收入，將來工作又有保障，未嘗不可吸引一部份青年投身於工商界。

以工作名位而言，接受過職業訓練的人假定能進工廠工作，所得的稱號不過是「技工」而已。假定採用所謂「學徒」制度，中學生祇可做「學徒」。「技工」、「學徒」這些名稱，未免有損青年的尊嚴、增加他們的心理負擔。與其讓青年人背上那些不雅的徽號，何妨使用「技術員」之類的好聽名稱。

從工資論，「低工資」有吸引外人來台投資等等發展工業的優點，但也有阻礙一些青年担任技術員工作的缺陷。一位高職畢業生在工廠工作每月假定有新台幣二千元的收入，就很可能比不上一位五年制工專畢業生一月的所得。在這種情形下，高職畢業生自然會去找進修機會、爭取較高的待遇。如果高職畢業生一月的報酬能提高，也許就有不少人會安心工作。當然，調整工資將牽涉不少問題。

經濟學者幾乎一致了解教育和經濟發展的關聯性。不過，他們所討論的問題，可說以發展職業教育為重點。平心靜氣的說，一般人不應忽略高等教育，但也不能輕視職業教育。尤其在謀求台灣省經濟發展的今日，似乎應多注意職業教育的擴充。

（本文係作者向外貿會香蕉小組所提研究報告結論中的大部份，蒙香蕉小組負責人同意在「新聞學

研究」雜誌上發表。）

註 解

- 註 1. Lerner, D., "Toward 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Modernization," in Pye, L. W. ed.,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335-336
- 註 11. Samuelson, P. A.,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58), p. 113
- 註 13. Meier, G. M. & Baldwin, R. E.,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9), p. 361
- 註 14. McClelland, D. C., *The Achieving Society*,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Co., Inc., 1961), pp. 427, 429
- 註 15. Meier & Baldwin, *op. cit.*, p. 219
- 註 16. McClelland, *op. cit.*, p. 428
- 註 17. 原野良 Samuelson, *op. cit.*, p. 169
- 註 18. Bishop, C. E. & Toussaint, W. D., *Agricultural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8), p. 185
- 註 19. Bauer, P. T. & Yanney, B. S., *The Economics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London: James Nisbet and Co. Ltd., 1957), pp. 85-86
- 註 10. Kindleberger, C. P.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McGraw Hill, 1958), pp. 82, 84

註十一· Pepelasis, A., Mears, L., & Adelman I,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1), p. 106

註十二· Nurkse, R., *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61-62

註十三· Lewis, W.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Illinois: Irwin, 1955), p. 236

註十四· Mead, M., *Cultural Patterns and Technical Change*, (UNESCO Publication,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5), p. 188

註十五· Schramm, W., *Mass Media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132

註十六· *Ibid.*

註十七· Lazarsfeld, P., Berelson B., & Gaudet, H.,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 pp. 152-153

註十八·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香蕉產銷輔導小組編印：「香蕉增產計劃暨有關產銷辦法彙編」，九十二至九十三面。

註十九·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人力資源小組編印：「人力資源發展分組研究報告」(上)，五十九面